

刘述先 著

黄宗羲
心学的定位

浙江古籍出版社

黄宗羲心学的定位
HUANGZONGXI XINXUE DE DINGWEI

ISBN 7-80715-116-1/B · 14

定价: 15.00 元

ISBN 7-80715-116-1



9 787807 151166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宗羲心学的定位/刘述先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0715-116-1

I. 黄… II. 刘… III. 黄宗羲 (1610~1695)
心学-研究 IV. B24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0261 号

黄宗羲心学的定位

刘述先 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责任编辑 郎震邦

封面设计 刘 炜

印 刷 杭州之江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15-116-1/B·14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黄宗羲哲学思想研究的拓荒之作

——新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序

吴 光

当代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刘述先先生，一向远离应时性的宣教活动或行色匆匆的四处讲学，而潜心于理论的创新与学术个案的深入研究。他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及其对“理一分殊”哲学范畴的新诠释，已被学界公认为有精辟独到的创新见解，而他的《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一书（以下简称“刘著”），则可谓黄宗羲哲学思想研究的拓荒之作。

梨洲先生黄宗羲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术大师，这是自清初开始就被学界公认的。但对黄宗羲作为民主启蒙思想家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则并非众口一致，甚至有“相反之论”。清末以来，随着思想的逐渐开放与民主共和思潮的兴起，黄宗羲的思想与著作引起许多进步学者（如谭嗣同、梁启超）与民主革命家（如孙中山）的高度重视，不仅黄宗羲的原著得以选辑刊行，而且研究性的论著也间有问世。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黄宗羲的学术与思想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通史性著作如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侯外庐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传记体专著如谢国桢著《黄梨洲学谱》，日本山井湧著《黄宗羲》，小野和子著《黄宗羲》；思想研究专著如古清美著《黄梨洲之生平及其学术思想》，张高评著《黄梨洲及其史学》等等。但上述著作重在探讨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对黄宗羲哲学思想则虽有所论及却语焉不详。

1985 年末，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当时刘述先先生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并曾于 1981 年底到杭州参加了“宋明理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与浙江学术界建立了学术



联系。而我当时担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并且是《黄宗羲全集》的执行主编，遂将第一册寄赠刘先生。因为这一册集中了黄宗羲的哲学思想著作，刘先生读后“思如涌泉，不可复抑”，于是参考其他文献，在半年时间内撰成了《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一书，由台湾允晨文化公司于1986年10月出版。

《黄宗羲心学的定位》，可以说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黄宗羲哲学思想的专著。其最大特色，就是用“倒溯”的研究方法，由黄宗羲到刘宗周再到王阳明，进而上溯到宋明理学巨子朱熹、二程、张载、周敦颐诸子，由此比较性的研究而确定黄宗羲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其最重要的结论也是梨洲哲学思想研究中的最新创见，则是突破港台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贬抑梨洲哲学地位的限制，指出梨洲“受戴山思想的影响最深，大体以师说的判准去简择阳明的思想，批评朱子的哲学，而把周、张、二程当作宋明儒学的共同渊源”，进而将黄宗羲定位为阳明心学的殿军、清代实学的开端：“梨洲在一种非预期的情况之下结束了一个时代，成为宋明心性之学的殿军，又下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转向到实学、考据文献学”（见本书自序、绪言）。刘先生的研究结论，虽然在对梨洲哲学的原创性方面认识不够充分，但在当时的确是慧眼独具、蹊径独辟的。我自己后来的黄宗羲思想研究，就深受刘先生的启发，而把黄宗羲当作宋明理学的殿军、清代实学的先驱以及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开山。

刘著出版以后，特别是1986年首届黄宗羲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举办并且《黄宗羲全集》于1994年全部出版之后，学界研究黄宗羲的论文大量涌现，有关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也陆续出版。其中绝大多数成果属于中国大陆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吴光主编的《黄宗羲论》（1987）、李明友著《一本万殊——黄宗羲的哲学与哲学史观》（1994）、朱义禄著《黄宗羲与中国文化》（2001）、冯天瑜等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2003）、张师伟著《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2004），等等。就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近二十年的论著成果大大超越了以往，但就对梨洲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研究而言，则显然无出刘先生之右者。



今年恰逢黄宗羲逝世 310 周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宗羲全集》增订新版。温家宝总理在收到友人转赠的新版《黄宗羲全集》之后,于 3 月 22 日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十分中肯地评价了黄宗羲思想的科学性、民主性及其以“万民忧乐”为天下大事的行事立身准则。此信公开发表(见《浙江学刊》2005 年第四期、《光明日报》2005 年 8 月 19 日)以后,对学者的黄宗羲思想研究起了很大的鼓励与推动作用。我作为《黄宗羲全集》的执行主编和黄宗羲思想的研究者,自然感到有义务向学界推荐有思想、有创见的优秀论著,于是建议刘先生在中国大陆出版本书的修订新版。刘先生欣然同意,遂对原著作了全面审订,并增加了《重访黄宗羲》等四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书对梨洲《孟子师说》哲学意蕴以及梨洲学与阳明学之关系阐论的不详,并批驳或澄清了某些学者对梨洲晚年思想变化的误解与曲解。完稿之后,邀我为之作序,并委托我推荐出版社。我忝为后学,不敢擅评先生论著之得失,但既蒙先生信任,便恭敬不如从命,于是略陈片言,简叙原委,姑称为序。既期先生之书能收启迪后学之功,更盼后之论者能继往开来,使黄宗羲思想与学术的研究超越前贤、更上层楼!

最后,我谨代表刘先生和我本人,对积极承担本书出版的浙江古籍出版社及其社长徐忠良先生、副社长尚佐文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乙酉岁末敬识



重访黄宗羲

——新版自序

我的《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一书出版转眼不觉已二十年。我的基本思路并没有变，但概念表达要更精准，就必须作出必要的调整。梨洲思想无疑是心学的一支，梁任公说他是“王学的修正者”，庶几得之。我的书已提出充分的论据说明，梨洲一生忠于乃师戴山的诚意慎独教；他的思想虽缺乏原创性，但还能持宋明儒学的睿识。故我把他当作此一思绪的殿军。清儒如颜元、戴震已完全丧失了宋明儒学对于“天道性命相感通”与超越天道的体证与向往，以致造成了“典范转移”的变化。

由这样的视域着眼，朱子的理学与阳明的心学都毫无疑问是圣学的分支。相对于朱子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思想，阳明的思想明显地展示了一种强烈的“内在一元的倾向”，主张超越的“理”具现在内在的“气”之中。我一贯坚持无论阳明、戴山、梨洲都维持了对于超越天道的向往，故此把他们的思想说成“内在一元论”，是不免误导的。此一词严格说来，只能用于王廷相、颜习斋、戴东原，当然也可以用于梨洲同门陈确的思想。从梨州与陈确二人的书信往来相互辩难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乾初已否定了超越天道的层面，而提出一种“内在一元”的论旨。我现在明白区分开“内在一元的倾向”与“内在一元论思想”的不同涵义，这样应该可以避免以前因用词不够精准所引起的不必要的误解。

二十年来，对于宋明儒学的研究，无论在资料或论述方面，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举例说，由沈善洪、吴光主编的《黄宗羲全集》十二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1985年出第一册，到1994年出齐；由吴光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二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由戴琬璋、吴光主编的《刘宗周全集》五册，由台湾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于 1996 年在台北出版。这些年来研讨会的举行、论文集与专著的出版，成果丰硕，此处不赘。

重点著作除了增补必要的资讯之外，在内容方面并不需要作重大的修改。但由于受到学者讨论的刺激，我又写了几篇有相当分量的论文。现在趁着我的书出简体字本的机会，挑选了两篇文章列在附录之内，一为《论黄宗羲对于孟子的理解》，二为《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并略加解释如下。

梨洲自述为何作《孟子师说》一书时曾经指出，戴山对于《大学》、《中庸》、《论语》都有著述，独《孟子》无成书，所以窃取其意，成书七卷，以补未备。但无论如何，这是梨洲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他如何通过《刘子遗书》吸收了其睿识，经过消化之后成为他自己的思想。香港学者邓立光认为，梨洲晚年因受到乾初思想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并以梨洲此书成段抄袭乾初《性解》一文不加声明，有剽窃之嫌。我驳斥了这样的观点。因梨洲希望阐明的是师说，那个时代学者没有出版研究的压力，根本缺乏“抄袭”的动机。而我认定梨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乾初这段话虽合乎师说，但他所得于戴山者在梨洲看来不过十之二三，故隐其名，免得给人留下一个好像乾初深入戴山思想的印象。就内容而言，梨洲沿袭戴山所作的《孟子》解，明显有内在一元的倾向，虽校正了朱子以二元思想释《孟子》之非，也未必就合乎《孟子》的原义，所以才会受到牟宗三先生的斥责。

而梨洲对阳明、龙溪虽然有较乃师更为同情的理解，但仍笃信戴山以阳明为因病立方、权实互用的说法，以至产生了一些一直未为人充分注意到的诡异现象，所谓阳明“学三变，教亦三变”的说法早已为人耳熟能详。钱德洪《刻文录叙说》所谓“教亦三变”的三个阶段是：“知行合一”、“静坐”与“致良知”。这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说法。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明儒学案》行世二百多年来，竟然让我这样一个不擅长考据的人在无意中发现，梨洲对于这一说法作了十分微妙的改易。梨洲谓阳明学成之后又有三变，这三个阶段是：“默坐澄心”、“致良知”，最后乃是“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非，



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致良知”由第三阶段变成了第二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无关教法。有关阳明最高境界体证描绘的文字系取自龙溪的《滁阳会语》。然龙溪讲述阳明悟后的变化，并未划分阶段，故“学成之后三变”证实无疑是梨洲自创的说法。我进一步探究，为何梨洲要作出这样的改易呢？我的推测是，梨洲把“致良知”往前推一个阶段，这样可以腾出位置来把戴山的诚意慎独教代替阳明的空灵境界的体证当作“终教”来安排。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曲解。阳明的“致良知”就是他的“终教”。他既明说“四句”教彻上彻下，那就是他最后的见解。龙溪倡“四无”教虽非无据，但的确有所荡越，而戴山“归显于密”显然是另一条不同的线索。但由此可以证明梨洲的确忠于戴山的思想，不能像牟宗三先生那样割裂戴山与梨洲。许多纠结实来自戴山，包括“盈天地间一气也”那种内在一元的倾向。牟先生固未否认戴山思想有些地方并不明彻，却给予了同情的了解。故我不赞同他过分贬斥梨洲为气化论者的说法，客观掌握的证据可以显示，梨洲思想毕竟不同于内在一元论，这由他与乾初的辩难就可以看得出来。梨洲认同戴山“气质之性”外无“义理之性”的论旨，但反对乾初将之滑转成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的说法，而批评乾初“所见为天理者，想是人欲之改头换面耳”。正因为梨洲还能坚持“天理”、“人欲”的分别，故我以之为宋明儒学之殿军，应该是言之有据的说法。就主观的愿望言，虽然梨洲亟望戴山之教昌明于天下，但事与愿违，他开创的思想实际指向阎若璩的考证，颜、李的实用主义，东原的达情遂欲，在清初造成了“典范转移”，故我才断定他是一悲剧性的人物。

当然梨洲生命的悲剧也展示在他不得不接受明代覆亡的事实，他自己终其生拒绝事清，但容许弟子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修《明史》，儿子百家也有分参与。最令人惊诧的是，近年竟然发现他为孙儿黄蜀应考加以关说的信函，还称当时的统治者（康熙）为“圣王”，这不免如白璧之玷。但有人攻击梨洲“晚节不保”，我觉得这样的批评不免过分了，曾写一短文予以回应，即《黄宗羲晚节不



保?——黄宗羲讨论会之后的省思》，作为附录之三收入本书新版之内。

由原著以及新加的三篇附录大体可以看出我对梨洲思想通盘的了解。此书出简体字本，由吴光教授作序，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进兴教授帮助取得原出版者台北允晨文化公司无偿授权，都是我所衷心感谢的。

在本书即将在大陆出新版之际，正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余姚市人民政府再次合作在余姚举办“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将会讨论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性质问题，并邀请本人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因此，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梨洲当鼎革之世，著《明夷待访录·原君篇》这样的大文章，痛批私天下的祸害。梁启超在清末把《明夷待访录》当作宣传品支持改革，在本土找资源，说《明夷待访录》是幼稚的民主。其实《明夷待访录》的理论基础与《民约论》截然有异。《民约论》基于权利的考虑，正是梨洲否定的东西。梨洲是要回返古代圣王之治。启蒙理性霸权在后现代受到严厉批评，现代西方见利忘义、政商勾结，罔顾细民死活，造成贫富悬殊，正是《明夷待访录》批评的对象。但梁启超因历史的误会借此书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让传统突破“民本”的规模，走向民主、自由、开放的大道，还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

刘述先

2005年8月18日识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初版自序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转型时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两部著作对于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一部是《明夷待访录》，一部是《明儒学案》。他的政治哲学理念，如《原君》所表达的思想，以及他对明儒像陈白沙、王阳明思想的述评，人多能言之。但他的思想的判准，他的心学，所谓“盈天地皆心也”，究竟实义是什么，历来学者并没有作过系统的考察，观念上是十分模糊的。我提议用一种倒溯的方法，把握到他的思想的定位，然后对他的《明儒学案》有一深入的省察，以确定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我治宋明儒学，受牟宗三先生的影响最深。他的三大卷的《心体与性体》，把这一门学问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他义理精熟，解析入微，才可以把许多不容易讲清楚的概念，赋以确定的内容。而绝非凭一时的感兴，诉之于联想，大发议论，这样的毛病虽熊十力先生也不能免。他的造诣尤非那些只能在外盘旋，作一些枝节的考据的人所能望其项背。读者看完我这部书，就会知道我对他的说法所取特多，是有一定理由的。

但是我既挖了进去，也就形成了一些与牟先生不同的意见。譬如我对王龙溪和黄宗羲的了解和评价，就和他十分不同。我虽承认王龙溪的四无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可以由阳明的思想衍发出来，但阳明说他的四句教是彻上彻下之教，龙溪却以之为权法，表面上看，龙溪的说法似乎更圆，其实是滑落在一边，不能谓之为无病，这就是他“荡越”的地方。牟先生虽也承认龙溪之荡越，但他仍然给予龙溪很高的评价，我对龙溪的评价可就低了很多。

反过来，牟先生对梨洲的评价不高。他觉得戴山的独体还能保持住超越性，到梨洲就滑落了下来，对于乃师只有肤浅的了解。



但我根据文献,发现像“气外无理”、“气质之性之外无义理之性”、“太极为万物之总名”一类的说法都出自戴山。这种倾向内在在一元的说法,超越义必然减煞,要有毛病,其根源也在戴山,不能单归咎于梨洲。牟先生也觉得戴山有许多横生枝节处,但他要在戴山、梨洲之间划分界线,而贬低梨洲。而我觉得梨洲在许多方面紧守师说,可能正是因为他的党性太强,才造成了他的局限。

最后,牟先生由哲学观点,讲到戴山即划然而止。但我却要兼顾思想史的线索,希望找到解释,为何梨洲在一种非预期的情况之下,结束了一个时代,成为宋明心性之学的殿军,又下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转向到实学、考据文献学。梨洲在他的时代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我不敢说我能平息这些争端,而只能提供我所看到的那个角度。此书引文较多,主要因为梨洲是思想史家,不是哲学家,他的思想必须以折光的方式来了解,读者耐心读完全书,始可以探骊得珠,对他的思想以及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与地位有一适当的了解。

我今年3月到8月有半年的时间由香港中文大学休假,到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研究。本来我并没有打算要研究黄梨洲。凑巧筐中携带《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是有关他的哲学思想的部分。我点读了《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孟子师说》之后,思如涌泉,不可复抑。乃参考其他相关文献,下笔撰述,几乎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写得相当顺利。这可以说是在朱子书完成之后写出来的一部比较像样的作品,也可以说是我的一项意外的收获。

在新加坡的时候,研究所提供了许多利于做研究的条件,是我衷心感谢的。当时一同在研究所做研究的有戴珪璋、冯耀明、翟志成、黄进兴等人,日夕过从,讲论有益,他们都看过我的稿子,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意见。梨洲很喜欢说“五星聚奎”一类的话,还把它写在《明儒学案》戴山的传记里面。我们也笑说,我们是“五星聚新”,虽然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但也爆出了一些小小的火花。对个人来说,这毕竟也是个难得的机缘,值得记一笔下来以志不忘。新亚书院明裕基金曾经提供补助,也是我要感谢的。



此外,陈俊民教授也看过这部稿子。他告诉我吴光君现在正负责编纂《黄宗羲全集》的实际工作。等材料出齐了,有关梨洲著述的许多事情当可以大白于世。读者不妨先把这本书当作一块敲门砖子。是为序。

刘述先

1986年8月28日



绪 言

黄宗羲(梨洲,1610—1695)不能说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思想家。这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只是它是用一种折光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著《明儒学案》,又着手编写《宋元学案》,虽未完成,但他的意图十分清楚,他想客观地研究宋(元)明儒的思想,通过主观的选择与判断,作出总结。而在事实上,他不只是变成王学的殿军,也变成了整个宋明儒学思想的统绪的殿军。也可以说,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却又在无意之中,促进了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一般对于黄宗羲思想的了解与分析,认为他是最后一位捍卫王学的大师,而归结于刘宗周(蕺山)的思想,这样的看法并不算错,但还不够细致精密。我现在提议作一种尝试,由另一个角度来看,似乎可以把问题看得更清楚。牟宗三先生认为,属于宋明儒学思想的统绪最重要的不外下列九人:周、张、二程、胡(五峰)、朱、陆、王(阳明)与刘(蕺山)。^①除了湖湘之学(五峰)早就式微,缺少深远的影响之外,其余的选择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我的意思是要用倒溯的方法才能清楚地把握到梨洲心学思想的定位。他受蕺山思想的影响最深,大体以师说的判准去简择阳明的思想,批评朱子的哲学,而把周、张、二程当作宋明儒学的共同渊源。他对这些思想了解的深度与分配的分量恰好与这一条线索成正比。我们研究他的思想,应该还原到他本来的轻重的比例。所以我感觉到,虽然大家习惯于由阳明讲到蕺山,但既有了这条线索之后,不妨反其道而行,由蕺山到阳明,则思想的界划转趋清明,不至失之于笼

^① 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台北正中书局,1968—1969年,第415页。



统。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我所征引的材料有限,不敢说是作成定论。只不过是提出一条新的线索,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有心人能够在将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黄宗羲对于蕺山思想的继承	1
第二章 黄宗羲对于阳明思想的简择	21
第三章 黄宗羲对于朱子思想的批评	41
第四章 黄宗羲心学的定位	62
第五章 黄宗羲《明儒学案》义理的解析	84
第六章 黄宗羲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106

附录

论黄宗羲对于孟子的理解	133
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	148
黄宗羲晚节不保？ ——“黄宗羲讨论会”之后的省思	167



第一章 黄宗羲对于戴山思想的继承

梨洲思想受刘戴山的影响最大。梨洲的父亲尊素与戴山为友，他是东林党的健将，因忤阉党下狱死，遗命令梨洲从学于戴山。梨洲既佩服戴山的人格，也佩服他的学问，作《明儒学案》即以戴山之思想为纲领。其序曰：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此无他，修德而后可讲学，今讲学而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时风愈下，兔园称儒，实老生之变相；坊人诡计，借名母以行书。谁立庙庭之中正，九品参差；大类释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坛块土，为一哄之市，可哀也夫！羲幼遭家难，先师戴山先生视羲如子，扶危定倾，日闻绪言。小子翼翼，梦奠之后，始从遗书得其宗旨。而同门之友，多归忠节。岁己酉，毗陵郭仲昇来越，著《刘子节要》。仲昇，先师之高第弟子也。书成，羲送之江干，仲昇执手丁宁曰：“今日知先师之学者，惟吾与子两人，议论不容不归一。惟于先师言意所在，宜稍为通融。”羲曰：“先师所以异于诸儒者，正在于意，岂可不为发明？”仲昇欲羲叙其《节要》，羲终不敢。是则仲昇于殊途百虑之学，尚有成局之未化也。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于是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由是而之